

研究論文

知識女工與中國大陸出版集團的 彈性僱傭制度改革¹

曹 晉

摘要

本文採用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以及研究者在出版業界的民族志觀察積累的研究方法，透過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圖景中的知識女工(女編輯)的勞動被納入現代化的文化生產市場，卻因出版集團化改革和國家去福利化所重構的等級制度令其勞動力貶值，生活水準停滯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護來討論知識女工的弱勢地位如何遭受彈性僱傭和社會性別的制度宰制，以期從多重權力關係的結構性壓制與國家進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構連(articulation)，來深度理解轉型中國的知識女工問題。

關鍵詞：知識女工、出版集團化改革、彈性僱傭制度

曹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國際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研究員，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曙光學者，哈佛大學燕京學者。主要研究興趣：批判傳播理論、媒介與社會性別研究、書刊出版研究。電郵：fudancaojin@sina.com

Research Article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System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Jin CAO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Chinese educated female workers by situating them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ally suppressiv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o globalization using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disclose how Chinese educated female workers have been shaped to fit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o see how their labor has been devalued, and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living standards hardly improve. It also highlights the low wages and precarious nature of their jobs, resulting from hierarch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both the conglomeratiz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ies and the budget cut on social welfare by the state.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ec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facing Chinese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re brought about by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which keep these educated female workers unprotected and exploited.

Keywords: female knowledge worker, the reform of publishing conglomeratization, flexible employment system

Jin CAO (Professor)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ender studies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System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ao, J. (2012).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System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 11–40.

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就全球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的議題研究來看，一方面，若干學者從關注各類婦女地位與價值如何遭受貶抑，以及被邊緣化、被剝削的經驗，例如她們在家庭私領域甚為艱辛，卻不被計算酬勞的再生產勞動就廣為學者論述；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期以來，國際政治經濟由凱恩斯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型，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創造的經濟增長與繁榮成為全球普及的正當性主流敘事，追求利潤與效率、削減公共開支、平衡預算、福利商品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性理念，市場化替代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的跨國擴張與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計劃與國際社會接軌和追尋現代化的抱負構連，大量婦女被轉化為廉價勞動力，繼而整合到被稱為全球勞動分工或全球流水線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有學者已經洞察到全球資本主義的興盛不僅是跨國的勞動分工，同時也是勞動力的性別分工(Zillah Eisenstein, 1998)。總體而言，婦女的工作趨向彈性而不穩定，甚至以家庭為工作場所，家庭重擔與加班工作壓力不減反增，婦女的階級權力地位並未與市場經濟遞增的趨勢匹配，反而向下流動。經濟重組給婦女帶來若干問題，正如國際勞工組織的蓋·斯坦林(Guy Standing)以「勞動力女性化」描述此現象並敏銳發現：資本家通過生產的全球化與對彈性形式的勞動力需求來維持或增加勞動力之間的競爭性，調整企業中的崗位結構，如此作為導致了勞動力的女性化，女性勞動力不斷增加的同時，她們的工作條件(工資、工作類型等)卻在惡化(Moghadam, 2005)。

自1980至1990年代以來，全球政治經濟呈現區域差異性的變遷，西方發達國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則在採購西方的經濟制度，以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等修辭再現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變遷。我們不禁要問轉型中國的知識工人階級是否實現如貝爾所預言的願景而真正掌握了市場的經濟命脈，引領經濟的穩步增長，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女工從市場經濟轉型中獲利了嗎？當婦女獲得教育機會而進入就業市場的訴求達成之後(這是婦女被賦予權力的表現)，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彈性僱傭如何利用了知識女工的性別身份和等級制度為出版業貢獻利潤？其勞動力的控

制(例如令知識女工的勞動貶值)如何鑲嵌在根植於中國市場經濟轉型語境的出版集團化改革的發展歷程之中?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婦女問題與全球婦女的研究議題有重疊和交叉,但出版業的女編輯群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語境中,儘管她們是編輯崗位的中心主體,²但針對知識女工的學術分析至今寥寥無幾,筆者以為融合社會性別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對這個從事文化產業的婦女群體的局部研究,正好可以透視當代出版集團化改革的某些痼疾,³並勾勒出知識女工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由於彈性僱傭制度的強制性剝削而付出的代價。

本論題試圖透過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圖景中知識女工(女編輯)的勞動被納入現代化的文化生產市場,卻因出版集團化改革和國家去福利化所重構的等級制度令其勞動力貶值,生活水準停滯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護來討論知識女工的弱勢地位如何遭受彈性僱傭和社會性別的制度宰制,以期從多重權力關係的結構性壓制與國家進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構連(articulation)來深度理解轉型中國的知識女工問題。若干學者在思索轉型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究竟是處在階級形成、階級再造還是階級消解的問題,本文也可以作為一個擴展的、再造的知識女工階級的探索案例,透視當代中國轉型時期知識階級的在業貧困現象,以及具有同一性的單位內部的階級分化。

筆者運用問卷調查和數據統計、合同文本的內容分析等方法描述女編輯與出版業彈性僱傭的圖貌;同時,經過與業界的長期人脈關係的積累,並在與不同職稱與職位級別女編輯的深度訪談過程中,獲取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情境,情理兼備的訪談資料積累,比完全仰賴數字統計的研究路徑更具闡釋力,訪談資料刻錄了出版業集團化動態過程中不被主流媒體彰顯的女編輯心聲,內容直接針對集團化改革成就所遮蔽的負面因素,以及市場經濟對知識女工勞動力進行靈活剝奪的具體進程。

僱傭彈性制度、知識女工與中國工人階級的學術論述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其《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中曾經敏銳體察到後工業社會的婦女、新工人階級等問

題，前者主要因為服務業經濟展現出以婦女為中心的趨勢，但婦女員工缺少組織(如工會)。其實，實際情況比貝爾的簡略陳述要複雜得多。知識工人，對於貝爾和其他著名的管理理論家來說，這一角色在後工業社會中是經濟主角，善於發揮腦力勞動的優勢，其勞動場所比產業工人更加平等，勞動衝突逐步消解。弗蘭克·韋伯斯坦(Frank Webster)在其《信息社會理論》的第三版中，闡述了後福特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彈性積累」制度(即僱傭、生產和消費的彈性)，一個新的僱員彈性制度(flexibility of employee)與「分工爭議」和就業「從一而終」的時代不同，韋氏指出「今天我們把適應性看作是核心品質，與『多技能』一起成為員工的就業常規。……工作和培訓的方向只是彈性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是收入的彈性(wage flexibility，根據個人幹了甚麼來付工資，而不是固定在雙方同意的協議或統一的國家薪酬標準上)，勞動力的彈性(labour flexibility，準備每隔幾年就改變工作，根據確定期限的合同聘用員工漸漸成為一中普遍的現象)，以及時間彈性(time flexibility，為了充分利用「彈性時間」、轉換工作的壓力以及消磨周末時光，兼職性職位數量在快速地增長。)(Webster, 2006: 80)韋氏還發現從1970年開始，社會正試圖組織一種新型的僱員模式，也就是非固定的彈性僱傭制度，而且許多公司開始裁員，只留下一組核心的永久員工，並利用外圍勞動力增加組織的彈性(任期不定的兼職者)，這被稱為「臨時勞工」(contingency labour)(聘用仰賴於經濟環境的好壞，一旦時局不穩，立即解僱)。據統計，「臨時勞工」佔美國勞動力市場的25%(Webster, 2006: 81)。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卡斯特詳細地描述了各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彈性工作模式的現狀及趨勢，不同國家的經濟體在工作安排上嘗試採用不同形式的彈性。「除了美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有超過30%的勞動力屬於彈性的工作安排模式。」美國的例外在於國家的制度中已經包含了勞動的彈性化。在美國，穩定的全職工作在數量上已經絕對減少，而彈性僱傭制逐漸發展起來了(Manuel Castells, 中文版2000: 324)。顯然，彈性(flexibility)作為後福特主義所強調的性質——無論其細節如何有差異，彈性很快成為了世界各產業的用工制度特色，乃至生產與消費的標準。彈性僱傭作為出版集團的一種規則，與國家其他行業的改革一樣已是大勢所趨，其支

配性共識通過集團各項制度的強化得到捍衛，而本論題試圖檢討其中被遮蔽的若干問題。社會學家懷特(G. White)發現勞動關係、工資制度、社會保障以及社會福利等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變革削弱或剝奪了國企工人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所享有的權利與利益，他指出「隨着企業經營者權力的增大，特別是經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大規模的企業改制之後，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迅速下降，與企業經營者之間在利益和收入方面的差距也逐漸加大。當企業目標轉為利潤導向的時候，工人成為工資收入者；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工人成為商品」(G. White, 1996: 433–457)。

世界出版產業也未能倖免於彈性僱傭制度的侵蝕，切拉·斯坦沃斯和約翰·斯坦沃斯(Celia Stanworth & John Stanworth)指出：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全球競爭、收購及兼併日益加劇，造成圖書出版產業高度集中於大型國際出版集團和媒體集團的壟斷性經營之中，出版集團的宗旨已經遠離人文，轉而注重經濟目標(Financial business goals)的實現，偏好官僚式的決策，控制英國主要出版社的大資本集團為了降低經營成本獲取更大利潤而對編輯實行彈性用工。英國出版社已經取消「全職的、永久的社內編輯」，實現了編輯僱員的「外包化」(Externalization)。編輯按出版社交付的工作量「計件」獲取酬勞，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以及收入福利完全靈活化，他們成為了失去出版社僱員身份的「自我僱傭者」(Self-employees)。此一趨勢非常普遍，幾乎不可逆轉，因為它賦予出版商經濟優勢。毫無疑問，支付有固定工資的職員和自由工作者，在成本上有很大的差異，僱傭前者必然資方要承擔所有的雜費(國家保險、生病、節假日、退休金等等)，以及支付昂貴地租以提供辦公空間。出版界的自由工作者難以發展其業務，根本沒有資本可以僱傭勞動力，只能找機會被臨時僱傭，他們沒有能力來提取剩餘價值和積累資本，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工作者已供過於求，再加上彈性僱傭的不穩定和緊迫性，由此加劇了其朝不保夕的生活處境和福利銳減等負面後果。這一經驗研究有75%的樣本來自婦女，其中82%有各種高學歷，27%有碩士學位，8%有博士學位，她們通過權衡而進入自謀職業的臨時工市場，往往是願望所驅使，或需要結合有償工作與家務(Stanworth & Stanworth, 1997)，但此文作者沒有着重分析資本

主義出版業實施彈性僱傭如何與社會性別權力結盟來剝削自我僱傭的女編輯，更多篇幅在描述自我僱傭的待遇與工作現狀，缺少社會性別理論的深入論述難度。

伴隨全球化進程中傳播資源與權力分配的不平等與不公正問題的緊迫性，以及婦女生活壓制性力量的複雜性，自新千年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社會性別理論的交叉分析成果已經深入洞察了社會權力分配、不平等與多重壓迫的同時發生，婦女雖然已進駐知識產業，但在工作場域面臨着更多的不平等待遇，又因傳統上婦女的家庭責任角色，知識女工不得不承受家庭、工作與市場經濟等場域或隱或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性別、種族、階級等多重權力壓制與剝奪，學術分析的深邃性已超越1990年代之前學者僅從婦女傳播從業者佔有的職位比例與從事報道的內容特色等着手，繼而得出婦女傳播從業者在產業內部如何被邊緣化的一般性分析。如胡斯(Ursula Huws)的《高科技無產者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一書的11個專題研究，就展現了階級關係如何圍繞快速重構的全球市場體系的浪潮與社會性別等權力關係結合，資本主義商品化不僅進入家庭環境，而且侵蝕與信息技術相關的多種知識行業，工資勞工與資本之間形成新的階級關係，資本構成了剝削在地白領、婦女健康與高科技勞工的社會權力關係。她注意到，雖然堅持認為科技節省了家庭的工作時間，但科技沒有給我們帶來更多的休閒，而是促使婦女開始進入有償勞動的行業。毫無疑問，電氣化和天然氣發電的普及，使發達國家的家庭裏擺滿了現代化的冰箱、煤氣爐、洗衣機和大量其他的家用電器，也大大削減了某些家務工作的勞作時間。但是，正如胡斯的文章所說，這些家用電器設備有自己的時間職責，並且擴展了人的需求和欲望，從而使人以新的方式花費了更多時間(Huws, 2003)，也就是說資本主義通過鼓吹家庭家電設備等科技產品的價值，動員婦女擴大購買服務的價值，資本與婦女連接起來幫助資本主義商品化了家庭環境。西方學者已經尖銳指出以工作量換取薪酬的勞動壓力普遍存在於婦女當中，她們為維持家庭開支，必須把工作場域不能完成的任務帶回家，家庭成為工作的延伸地帶，也是傳統意義上有償勞動的場所。全球資本主義的當代化身賦予了婦女一個多元化的角色，既是妻子、家

庭主婦、兒童保育員，同時還是一名低薪勞工(Zillah Eisenstein, 1998)。凱瑟琳·麥可切爾(Catherine McKercher)還指出家庭與工作的範疇已相互侵蝕，以至於家庭和工作的相互滲透，導致了家庭和工作逐步失去各自獨立的價值。「如安東尼·涅格里(Antonion Negri)和提滋娜·特拉諾娃(Tiziana Terranova)在內的自治學派學者們(the auto-nomous school of scholars)的論述，該學派的觀點聚焦於新科技所帶來的解放潛力和伴隨新科技產生的知識工人階級(a knowledge worker class)。根據這個觀點，家庭和傳統的工作場所都成為了工作和遊戲之地，它們的相互建構進而向資本主義努力削減有償勞動的行為提出了基本的挑戰。」(轉引自Catherine, 2008)這些研究表明高科技帶來的遠程工作便利或是家用電器的普及，並沒有解放作為勞工、妻子、母親、家庭主婦角色的婦女，也未改進婦女工作和家庭的雙重需求的平衡關係，雙肩挑反是增加了婦女的負擔。

利薩·麥克勞克林和海倫·約翰遜(Lisa McLaughlin & Helen Johnson)所著〈亞太地區的婦女與知識工作：日漸複雜的技術賦權〉一文則洞察了亞太地區知識勞工性別分化的複雜情形，基於其在該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她們論證了在婦女參與的若干不同知識勞動領域裏存在着的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張力。她們非常清楚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婦女會遭遇到以公司和政府組織的形式存在的制度性權力，也還存在着多種形式的下層力量，其研究特別提及亞洲婦女馴服的工作個性和照顧家庭的強烈責任感如何被僱主利用來為市場生產服務。婦女作為勞動力和ICT的使用者沒有得到技術進步的解放，因為工廠和很多產品設計和內容都是由男性所主導，並為男性服務，性別分隔的數字鴻溝仍是一個越發嚴重的問題，因為首先婦女工作者承擔了雙重責任，投身到工作中的同時，又能夠維持傳統的家庭生活；其次對通過婦女去技能化的方式實現的低層次科技勞動者的女性化；三是在工廠裏常出現的用父權制式的政策對待婦女(Lisa McLaughlin & Helen Johnson, 2007: 249–266)。

上述研究提出的彈性僱傭、高科技無產者與知識勞工的概念，以及信息社會新階級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性別權力的關係討論，深化了資本的含義並擴展了階級的定義——資本不僅僅有投資價值；

階級也不局限於傳統的工人階級，社會性別權力與其他力量相互交織且被重新定義，被忽略的新知識勞工階級與資本剝奪性如何由資本構建的社會關係中得到再生產的問題意識。這些論述對詮釋轉型中國出版業的用工制度如何重塑知識女工的工作現狀與生活負擔，開啓了全新的視角。

部分海外漢學家和本土學者對中國工人階級轉型的理論闡述資源相當豐富，視野開闊，對本土社會情景也有深入、睿智的洞察，如李靜君(1999)、沈園(2006)等，但其研究仍然是傳統的國有企業工人和農民工的視野，並沒有注意到中國大陸正在擴大化、去權力化的知識勞工階級及其在市場化境遇中被剝奪和階級流動的問題。張宛麗發表於《社會學研究》的綜述性論文〈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總結了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核心論述問題，從作者勾勒的文獻來看，大陸學者就工人與知識分子的研究視角都沒有觸及到知識勞工的問題，不過，作者卻敏銳捕捉到女性利益在「市場經濟」轉型期受損，她歸納為「女性利益受損在社會利益格局中成為一個新生的、特殊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在原體制下，女性群體社會利益受到相應的關照和保護，社會地位受到社會主義制度及體制的肯定。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被原體制安排所肯定、保護的社會地位受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原體制無法滿足女性中覺悟者們的發展及其相應的利益需求；而處於轉型期的『市場經濟』，又只看重女性勞動力的廉價利潤，不會給與女性的社會發展以高投入。由此，女性群體總體社會地位下降問題日漸突出。」(張宛麗，2000: 38)。張文轉型期的「市場經濟」正是19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迅速從凱恩斯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型，中國在1990年代以後逐步接受此一經濟模式的產物，中國大陸知識女工在1980年代教育正規化之後，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獲得更多就業機會，但同時，她們僅僅作為勞動力大軍的廉價勞動力的一員，滿足了「市場經濟」語境中僱主的利益最大化，其社會權力卻因為失去固定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下滑。這一問題意識對本文的論述尤其重要，知識女工的利益正在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改革的出版集團化進程中遭遇嚴重剝奪，她們是婦女群體中的一部分，其勞動力價值的變化與地位的下降值得學界關注。

知識女工的田野考察

本論題研究考慮到數據調查的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專門選取成立於1999年2月24日，經中宣部、新聞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全國第一家出版集團，也是上海規模最大的出版集團，其集團化改革的進程標志着出版產業的結構調整與市場轉軌。田野調查數據顯示2003年，該集團被列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之一，原屬市新聞出版局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加入集團行列，集團劃歸市委宣傳部直接領導。2005年11月26日，集團成為股份公司，以大部分經營性資產注入股份公司，擁有公司70%的股份。公司現擁有全資或控股成員單位26家，其中包括14家圖書出版機構，4家音像出版社，兩家電子出版社，41種期刊和5種報紙，佔據當地三分之一的出版市場。為了兼顧雜誌出版產業的體察，又將2001年成立、隸屬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的某教育報刊總社（集團化運營）列入研究範疇，該總社擁有《少年日報》、《上海中學生報》、《家庭教育時報》、《上海教育》、《當代學生》、《成才與就業》、《上海托幼》、《好兒童畫報》、《教育參考》《康復》、《計算機教與學》等三報八刊和中國教育報上海記者站，因其行政隸屬關係的複雜性，該總社至今未能完全以集團命名，但其內部的僱傭制度則徹底依照市場化的集團運作模式進行了全面改革，內部員工多樣的僱傭合同充分體現出行政力量如何與市場經濟糾結。這兩個出版集團的建設目標非常清晰，都試圖努力成為跨地區、跨行業、跨國界，實現資本一體化、經營多元化、手段現代化的出版集團。筆者於2009年5月分別向出版集團與某教育報刊總社發放各50份（共計100份）調查問卷，隨機選取具有老人與新人身份的女編輯（年齡分段如表所示）填寫調查問卷，因筆者曾經在出版業界工作過，建立了廣泛的女編輯人脈關係，所以最後順利收回了100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見附錄），課題組還以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彌補問卷的缺漏，深入訪問了20位女編輯，其中5名編輯部主任（中層領導），5名資深編輯（1980年代本科畢業進入出版社）以及10名有碩士學位的、2001年後進入出版業的新人。

根據回收的100份女編輯的問卷抽樣調查統計，出版集團被調查者20歲至29歲佔23%；30歲至39歲佔47%；40歲至49歲佔30%。其中

未婚者佔26%；已婚者佔74%；未育佔62%；已生育佔38%。專科與本科佔56%，碩士佔44%；有戶口者佔93.8%；無戶口者6.2%；一年一簽佔62%；兩年一簽佔8%；三年一簽佔30%。教育報刊總社被調查者30歲以下佔26%；30歲至40歲佔6%；40歲至50歲佔20%；50歲至60歲佔6%；未婚者佔18%；已婚者佔82%；專科與本科佔90%，碩士佔10%；未育佔62%；已生育佔38%；有戶口者佔92%；無戶口者佔2%，其他6%；一年一簽佔10%；兩年一簽佔10%；三年一簽佔10%；其他70%。出版集團的老人與教育報刊總社比例一致，都是30%（「老人老辦法」），在國家「再分配經濟」與「市場經濟」混雜的轉型過程中，她們相對新人，具有文化事業身份與資歷的優越性。但在出版集團內70%的新人因進入的年限和學歷或是個人專業條件不等，簽署一年、兩年或三年的「新人新辦法」彈性僱傭合同。

據出版集團內部材料記錄，該集團在1999年實現利潤5,804萬元，總資產48,241萬元，淨資產23,710萬元，出版圖書、音像製品、期刊3,371種（其中圖書初、重版比例為45:55）。到2007年結束，出版集團共出書7,735種，出版報刊44種1,085期，出版音像電子產品416種。書報刊音像電子產品造貨總碼洋187,152萬元，完成全年計劃的111.8%，圖書發貨總碼洋161,627.9萬元，完成全年預算計劃的111.9%，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6,414.88萬元，利潤11,274.79萬元，同比2006年分別增長6.29%和12.74%；總資產和淨資產比年初分別增長18.83%和12.74%（《出版集團彙報材料》，2008），這些數字與1999年的統計相比，該集團增長趨勢良好，但從女編輯員工的問卷和訪問中發現編輯利益下降的走勢，卻與集團上升發展的格局相矛盾。也就是說，該出版集團女編輯的收入和整個集團的利潤增長並不同步。如果把工資作為編輯勞動力商品化的基本途徑，出版集團是經濟實體，集團領導具有自治權力來制定編輯勞動力商品化的計算標準，底薪就是彈性合同制新人的工資表現，獎金則要仰賴編輯的贏利能力。問卷顯示，全部填寫問卷的女編輯都否認出版編輯這一職業令人感到滿意，她們當中97.6%認為與外地（如北京、南京）同行比較，該出版集團的編輯收入普遍偏低，該出版集團的50份問卷的平均年薪也就五至六萬元，在封閉式的個人深度訪談中，有四位資深編輯反映其單位八年沒

有給予加工資，集團內某學術品質頗優的出版社的社科部全體編輯在整個2008年沒有任何年底獎金，原因是按照集團利潤指標的考核，這些社科編輯的贏利表現為赤字，只能享受底薪。一些資深的老編輯尖銳地指出出版集團自成立以來，加重了對編輯員工的剝奪，因為在集團化改革之前，每個出版社的上級管理單位是由國家行政撥款的新聞出版局，其履行管理職能卻不與出版社爭利，新聞出版局每年都把各出版社上繳的管理費以資助大型出版項目等多樣名目返回到出版社，但集團化改革之後，新成立的集團集中了各社的人事權力、財務權力和固定資產（包括各社長期積累的現金和房產），總部所有人員的費用都需要從下屬出版社以管理費名義掠取，前後對比，集團化改革的權力重組實際是增加了每個編輯的利潤指標和工作總量，集團與下屬出版社的垂直領導關係保證了集團奪利的合法合理。在出版集團的運作中，利潤已經成為衡量知識勞工勞動力價值的核心準則，知識工人勞動的商品化之深度與強度可見一斑。編輯的辦公室勞動不是工人的工廠勞作，在工人階級的論述中容易被忽略，而實際情況是辦公室的知識勞工沒有從市場經濟分享到紅利，從田野考察所瞭解的知識女工的生活與工作實踐情況，可見作為政治進程的彈性僱傭制度與強制性市場經濟邏輯已經侵蝕辦公室空間。集團在侵佔分社利益的同時，更是剝奪了分社編輯的勞動創造。

報刊總社（下設6個分社和5個經濟實體）的僱傭制度更具多樣性，各分社在總社成立之前是佔據國家壟斷性教育出版資源的典型國有文化事業單位，各分社的正式在編人員都是文化事業編制的身份。自總社成立之後，採用「新人新辦法」的彈性僱傭制度，新進人員屬於僱員派遣性質（隨時可以流動派遣）。不過，由於人員到齡退休等原因，每年總社也有若干個事業編制空額，給表現優秀的非事業編制員工提供轉制機會。此外，由於實際工作的需要，有些到齡退休的員工按規定可以申請延聘，分社也可以根據需要對社內及社外的退休人員進行返聘。而籠統的事業編制中，又分為全額財政撥款的事業編制與自收自支的事業編制兩種類型，俗稱「全國糧票」與「地方糧票」，後者的經濟收入絕對依賴總社的收益狀況，沒有前者的薪水與福利的穩定係數，但又比2000年後進社的彈性員工地位要高，因為他們有編制。訪談瞭

解到彈性僱傭制員工(僱員派遣)普遍認為自己的收入少於同級別、同資歷但擁有事業編制的同事，關鍵在於彈性僱傭制的編輯底薪以外的獎金收入、內部分配政策及養老制度因為身份的懸殊而拉開差距。⁴在被訪談的教育報刊總社的新人(僱員派遣類)一致反映無法享有除國家強制規定以外的「優惠」，而該社具備事業編制的老員工，不僅享有國家財政「加工資」的規定動作，而且享有地方財政「加工資」的複選動作(選取自研究助手趙曉軍的訪談筆記)。

除了老人、新人界定的彈性僱傭身份差異之外，出版集團和教育報刊總社都根據編輯能力和資質對新老編輯的工作位置以策劃編輯和文案編輯兩類型進行重新區分其編輯身份，各類身份的差異暗示着必然的收入差別。出版集團的問卷策劃編輯佔22.5%；文案編輯佔37.5%；既做策劃、又做文案的編輯佔40%，儘管身為策劃編輯，但她們有14.8%認為兼具社會、經濟雙效的好書難以尋覓；7.4%認為低稿酬導致低質量；35.2%認為競爭激烈；24.1%認為人脈短缺難以組稿；1.9%認為缺乏培訓；16.7%認為體制僵化，這些因素導致策劃編輯壓力重重，往往焦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教育報刊總社策劃編輯佔28%；文案編輯佔26%；既做策劃、又做文案的編輯佔16%；其他30%，女編輯的策劃問題因產品屬性有別，後者主要生產教育媒介產品，面向上海教育界的中、小學師生服務，她們中21.7%認為報刊總社的產品選題雷同，缺乏創意；23.2%發現信息、作者、人才資源匱乏和作風浮誇、不深入實際、體制問題和時效性較低，教育行政權力滲透報刊總社的癥結可見一斑。

筆者覺得最為普遍的問題是所有訪談與問卷統計都顯示年終績效考核的不透明性與彈性，按照考核原則，編輯的獎金應是扣除年度所耗費的成本和15%的管理費後的毛利與獎勵系數的乘數，這種彈性考核標準的基礎是編輯除了養活自己的勞動，還要擔負出版集團管理層、出版科與發行員工的開銷。從問卷與訪談的資料來看，女編輯認為出版機構領導的隱蔽操作決定了女編輯的年終獎勵金額，如問卷中有23.8%比例的圖書女編輯認為考核是按照資歷，而非真正的績效，另28.6%認為獎勵完全以利潤為指揮棒，根本不考慮社會人文價值與學術高端產品的知識含量與資源積累的難度，9.5%認為選題是領導分配，

並非編輯的自主創新能力，33.3%認為獎勵缺少透明度，從不公開，再有4.8%的女編輯認為獎金太少，領導不過是粗略評估每個編輯在領導心目中的分量而大致給個分配方案，就算有些出版社年終獎金依據編輯一年的出版產品所耗費的所有成本(包括出差費、快遞費、工資、四金等)與贏利狀況來給予獎勵，數據未必準確。報刊總社作為佔據壟斷性教育出版資源的集團，國有企業的弊端體現得更加充分，22.9%的女編輯認為獎懲機制存在缺陷；22.9%認為重量不重質；17.1%認為缺乏科學的考核指標；14.3%認為考核與績效不掛鉤；8.6%認為考核論資排輩；5.7%認為執行力差；8.7%認為選題領導分配導致不公開、僅為領導意志。訪談中的女編輯都提到一個普遍的現象：考核指標並不針對集團領導發生作用，那些與領導建立了密切、良好人緣的編輯，做得差一些也沒有關係；而貢獻了豐富出版資源的骨幹卻可能因為平均主義未能得到實際勞動的公正回報，訪談到的兩位資深女編輯所責編的暢銷書業績在出版圈內眾所周知，但考核的獎金並沒有真正兌現。這些因素導致了知識女工對編輯職業的抱怨，6.7%的女編輯不無憂慮地反映唯利潤馬首是瞻的市場訴求依然難出雙效書，利潤反而降低，若干骨幹編輯強調不能全用利潤指標考核文化產業，問卷調查有63.3%的女編輯認為當前的集團化不夠真正的市場化，而是行政指令的市場化。數據顯示出版集團改革仍然沒有解決出版產業已有的問題(如發行與編輯的矛盾)，且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比如出版集團的女編輯29.8%認為集團改革未能有效整合資源；12.8%認為集團侵佔各出版社利潤；6.4%認為過分注重利潤；51.1%認為沒有完全商業化、操作不規範。報刊總社的女編輯29.2%認為未能有效整合資源；25%認為規範市場未建立，沒有完全商業化；16.7%認為總社機構臃腫；12.5%認為流於形式；8.3%認為未能協調好分社利益關係；4.2%認為總社侵佔分社利潤；4.2%認為大鍋飯現象嚴重。

出版產業曾經被媒體宣揚為二十一世紀的「朝陽產業」，但從筆者的田野考察來看，出版業內的知識工人沒有如此樂觀的預期，她們都談到集團化改革後，海外資本與傳播新科技對本土出版行業的威脅，當我問及她們為甚麼不離開這個行業時，女編輯們會反問：「往哪裏走？」的確，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已相當飽和，職業之間橫向、縱向的

流動空間已很狹小。而且在訪談中，新老編輯都捕捉到一個業內勞動力的變化；首先，自1998年以來，出版業招聘的新人有80%原戶籍地不屬於上海，外地人在出版界就業的數量迅猛遞增，對這80%的新人而言，她們會認為出版業的薪水儘管不盡仁義、前景也不看好，但最起碼出版機構解決了戶口入籍問題(2006年以後另當別論)。其次，進入出版產業的男生越來越少，女生比例空前居多。

最後，根據田野調查，發現傳統出版業與廣播電視、報業或是通訊業相較，在整個傳播產業結構中的生產總值與利潤比例並不佔據主導地位，甚至相對邊緣。但出版業所僱傭的編輯員工的知識結構與業務技能比之新聞業更具專業性，文化學術含量較高，但其收入與產出不成正比，在行業內和廣播電視、報業、互聯網等媒體的員工相比，出版編輯的收入則是相形見绌，且待遇堪稱低廉。集團是知識女工的一切權力與資源配置的泉源，在這一制度安排的背景下，知識女工因所在集團的差異必然會造成因個人單位地位上的差異而形成的個人地位差異。這種個人地位差異，不僅體現在作為集團一員的個人收入、福利等經濟實力的懸殊，而且也連帶涉及到個人的生活品質與未來前景的差距。

知識女工、貶值的勞動與出版集團彈性僱傭制度

邁入二十一世紀，巨無霸式的媒介集團的「全球擴張」已經盛況空前，傳播產業的商業化、私有化、集中化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沒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劇烈；出版、廣播、電訊、信息服務日益交融，最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手段包括生產、營銷、金融以及會計等流程與技術已滲透到媒介的各個面向，⁵一個新形式的等級組織結構正在通過傳播產業的滲透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來，媒介組織的贏利目標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文化特權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西方傳播和文化在快速變化的經濟中佔據了核心地位，日新月異的傳播新科技的迷思，掩蓋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快速擴張以及制度、意識在地理空間的延伸，部分發展中國家正以國家政策主導的方式迎合、接受、消化西方傳播產業的海外擴展，這就驅使本土媒介傳播產業認同降低成本的信

息技術從總體上來提高生產力，並以集團化改革來達到產權的高度集中，降低勞動成本，縮減媒介從業員工的福利，最大化地追求企業可持續增長的利潤。這種有效的整合從整體上深刻地改變了文化產品的特點，文化產業急劇增長，利潤可觀，文化產品逐漸與工業產品融為一體。

在全球市場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國難以置身事外，文化產品的生產也逐漸與西方經濟生產模式的市場方式和組織結構接軌，出版事業正是在這樣的制度情境中，成為被預期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及利潤的出版產業轉型。⁶傳媒集團作為中國後WTO時代、中國應對國際挑戰而提出的媒體改革措施，自1988年新聞出版總署推進出版業集團化定點實驗改革以來，被認為沒有工作效率的、體制退步的傳統出版社，歷經十年歷程整體完成了集團化改革，隨之而來的市場宰制清洗了過時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單位的社會信譽、職業聲望與員工福利待遇早滂保收的穩定性，出版業的編輯因為文化事業身份轉向企業工人身份而失去往昔的資源配置優勢，取而代之的是「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彈性僱傭制度，成為出版業界僱傭制度的剛性原則，或者說出版集團用工制度的支配性共識，所有遵循新辦法彈性僱傭制度僱傭的出版編輯（知識勞工），在合同生效當日就被宣判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新身份——全職臨時工（Full-time temporary worker）。⁷彈性僱傭是西方資本主義流行的「市場魔法」（magic of the market），從1990年後期至今，滲透並覆蓋轉型期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產業，年輕編輯失去終身保障，佔據出版業編輯員工主體的知識女工（女編輯）勞動因此被重新界定為臨時的、可替換的、集團彈性僱傭的勞動力而迅速遭遇貶值。

一方面，出版產業運作的集團政體的內在商業邏輯（inner logic of conglomeration regime）直接導致知識女工勞動的貶值，具體的微觀操作包括如下兩種途徑：首先，「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彈性僱傭合同改寫了女編輯的身份。自1986年開始試行的勞動合同制到1995年底被普遍實施，永久僱傭制被合同制取代，這一勞動合同制的改革落實到出版機構，就靈活執行為文化事業身份，但按照企業化管理運作，這個時期的編輯績效考核開始醞釀、完善，但對上海出版業編輯的衝擊還不是非常劇烈，因為那時房地產與公費醫療制度改革尚未啟動，

編輯的穩定收入與職業聲望依然令人體會到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單位的優越性。但自1998年出版集團化開始的企業改制的推行，編輯崗位完全轉型為企業崗位的徹底市場化改革，終結了文化事業身份的國家主人翁(意味着鐵飯碗)優勢地位，作為知識分子一部分的編輯從受勞工社會契約(保障可供謀生的工作，並附有一系列福利)保護的文化人才，轉變為純粹替企業和作者追求生產效率和出版利潤的做嫁衣者，或者說文化企業的廉價民工。與其說彈性僱傭合同增強了編輯或是出版產業從業者的選擇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不如說增強了集團管理高層的政治、經濟特權，並強化了知識勞工對集團的經濟依賴。在對知識勞工的普遍剝削基礎之上，出版業的彈性僱傭制度切實地保護了集團高層的既得利益(他們的級別獲得全公費醫療等福利保障，工資與獎金以市場標準核算)，集團領導替代廣大知識勞工成為市場經濟的主人翁，其身份從文化單位幹部轉型為經理、總裁，實行企業化的年薪制，勞動力得到增殖，他們掌控着出版集團的集體財產和集團員工的勞動力價格。那我們就發現「政治權力的維續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在市場體制條件下，政治權力之所以持續，是因為市場是在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下崛起、成長，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可以優先到市場體制中獲得實惠，另外就是市場體制往往是在再分配體制內部發育、成長、壯大。」(邊燕杰、羅根，中文版，2002: 427-459)。這一論述對認識出版集團作為行政權力指令性產物的經濟實體很有幫助，出版集團雖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但在中國本土情境中，仍然部分延續再分配體制的功用，出版產業集團化運作的市場體制正是在行政規劃的出版社合併中塑造，出版集團的高層相當一部分是出版局直接進入實體的局級幹部，他們從出版產業轉入市場體制的進程中獲利匪淺，彈性僱傭制度的推行更加強化了集團高層的特權，而非促進知識勞工勞動力的增殖與知識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

其次，集團化改制重組了出版產業的權力格局，編輯勞動力在出版集團權力重構的過程中要創造所有出版環節的經費開支。集團化改革開始，出版實體都脫離了新聞出版局這個行政機構而在集團總部的管轄之下，出版集團重組過程中增加了一系列辦公室和處級、科級領導，集團高層領導的行政級別都按照改革政策晉升到副局或是正局

級，集團總部新增權力機構的消費不是國家撥款，自負盈虧的收入意味着是集團利用權力，控制從編輯贏利的財富中爭利來滿足集團的開支，這就表明編輯的創利勞動才是其消費的資金泉源，所以15%的平均管理費也由編輯承擔。但凡對業界有深入的瞭解，我們都會明白——出版產品是否贏利，不僅是編輯生產與市場流通的結果，還要受制於多種綜合因素的影響。而且，一個出版產品的編輯、印刷與流通的成本是編輯所不能掌控的，因為編輯的權限僅僅是選題生產與審讀文本，文本的製版與印刷的成本控制，是出版機構出版科長（向來是出版機構的權威人物之一）的學問和權力，出版科長對每一出版產品的製版與印刷公司的選擇，自有其建構的社會網絡的人情、面子的緣由，領導制定的種種內部行規，暗示編輯最好不要越界去過問這一經濟利益敏感的中樞地帶，但令編輯倍感不公正的地方，就是出版機構的考核標準集中考核編輯的生產與贏利能力，每一出版產品生產與流通的成本與利潤帳目考核都由編輯承擔，難怪出版集團在人力資源的定位中，文案編輯的基本功退居次位，迫切要求的是編輯必須熟悉市場與經營信息，最好每做一本書都有滾滾而來的利潤，市場素養優越於人文素養，後者因缺乏商業意識而被貶值，甚至被拋棄。如果圖書在書店滯銷，書店有權力要求出版集團無條件退貨，編輯的勞動在此過程中再次承擔出版產品的經營流通與現金回籠的風險與責任。那些負責人文社科的編輯，在集團利潤指標的壓力之下，被迫放棄一貫堅守的人文傳統與審美原則，導致出版的選題標準嚴重下滑，跟風與買賣書號現象泛濫。

上海出版產品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別化傾向異常明顯，女編輯佔據編輯崗位的主體，出版科長幾乎都是男性，發行崗位男性員工為多（發行作為出版業流通環節，需要出差推銷業務），後兩者在出售女編輯的勞動產品，以女編輯的勞動為基礎來獲取銷售利潤，如果產品銷售業績嬌人，那麼發行員工的年底獎金完全可以樂觀預期，其年終考核的標準比出版社對編輯崗位的贏利計算簡單得多。出版科的利益並非仰賴年終獎勵，關鍵是日常生意網絡的資源分配權力置換的製版與印刷業務的人情與資源回報，女編輯勞動的價值由此而被隱藏性地榨取與剝奪；如果產品銷售業績欠佳，那麼，出版科與發行科的理由非常充

分，可以把責任推卸給編輯，歸咎編輯沒有市場意識導致銷售的產品缺乏競爭力，從而扣除編輯的年終獎勵，通過年終績效考核制度的實施，女編輯的勞動在成本與贏利指標的不公平衡量中喪失了應有的尊嚴與價值。

林南和邊燕杰(中文版2002: 10)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研究發現，計劃經濟的勞動力是國家分配給單位的，勞動力不允許自由流動，而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已經獲得彈性合同的自由而可以任意流動，但出版行業新入行的年輕女編輯面對低薪與缺少發展機會的困境，討價還價或是跳槽流動的能動性又在近期因就業壓力而有所萎縮，中國出版業最不缺的就是勞動力後備軍，所以巨大的就業壓力阻止了市場經濟承諾的自由流動。那幾年資深厚的女編輯也不滿意工作狀態，但她們年齡優勢不再的憂患意識也擔心在新人輩出的浪潮中失去已經熟悉的崗位，與年輕女編輯相比，資深女編輯更加老於世故，維護單位既定的權力操作，善於從支持領導的作為中獲得利於自己的資源，而不是借助工會或者婦女組織解決問題；出版集團的領導在必要的情況下，會派出工會主席或是女工負責人出面協調矛盾，以情感撫慰替代實質性的勞資協議。李靜君發現生產和經濟效率的首要地位，意味着經理高於或覆蓋於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的權威。國企財政困難也削弱了工會組織資源，並威脅到工會幹部的個人職業生涯(Lee, 1999)。在出版業內，情況與李研究的國有企業類似，出版集團工會和婦女組織(如形同虛社的上海市女編輯協會)已因集團管理的企業屬性而被去權力化，弱化了自身為編輯員工爭取利益的正面功能，這意味着女編輯交涉能力因其依賴環境遭到削弱，出版集團57.7%的女編輯沒有得到婦女編輯或是工會的維權，教育報刊總社僅38%得到組織幫助，可見整個出版產業的抗爭與抵制，或是協商的傾向都在淡化，替代出版機構福利系統的新社會安全網的建立並不成功，編輯工作的社會責任與文化抱負逐步退出編輯職業生涯的理念追求範疇，獎金與商業出版的成功才是編輯的核心目標，低薪、獎金刺激與崗位彈性聘用成為新的威脅編輯的審查力量，為確保成功的職業生涯，編輯來不及過問時事政治或是社會關懷，女編輯越來越政治冷漠、去政治化和安於現狀，馴服於市場化的出版集團政體(publishing conglomeration's regime)。⁸這就是市場經

濟轉型語境中的出版集團化改革，以經濟權力宰制了知識女工的能動力量，反過來，馴服的社會性別意識形態又為出版集團的經濟利潤增長作出更加穩定的貢獻。

凱瑟琳·麥可切爾與文森特·莫斯科在《信息社會的知識勞工》的導論中強調必須將知識勞工所面臨的具體議題置於由相互聯繫的經濟、政治、文化力量交織而成的、更廣闊的社會整體語境中(Catherine McKercher & Vincent Mosco, 2007)。筆者充分認同此一具體問題語境化的研究路徑，繼而探索中國大陸知識女工勞動力的貶值，如何與外在的國家市場經濟轉型的宏觀語境存在密切關聯。中國大陸1990年開始的福利商品化歷程顯示，傳統出版社的分房、醫務室、食堂餐飲服務、勞保、教育產品等國家固定福利經過貨幣分房、公費醫療改革、收取學費等福利服務社會化的制度性措施洗禮，直接導致社會福利遞減，各項福利服務的收費接近完全市場化的價格。知識女工不得不承受物價上漲和收入彈性的後果，因為婦女管理着家庭預算和開支，福利產品商品化變相地增加了婦女的生活負擔，並降低了其生活水準。知識女工同時承受集團化制度，犧牲福利安全網絡和市場化效益與利潤當先的雙重壓力。1950年到1998年集團化改制前的傳統編輯是全職且終生聘用的僱員，社會主義的國家福利給予編輯基本的住房與醫療保障的承諾；但伴隨全球競爭與收購、兼併的日益加劇，造成圖書出版都集中大型國際出版集團和媒體集團旗下，這種趨勢也衝擊了國內呼籲傳媒改革的中國出版業，大陸集團化改革應運而生，以行政命令强行打造的出版集團(數家出版社的合併)，以激烈競爭、全球化和商業化為新特徵，意在實現商業贏利、經濟持續增長的終極目標，為保持市場份額和分散風險，大大增加出版數量，同時減少業務費用，其中一個關鍵戰略就是彈性僱傭制度節省相當的人力成本，收入福利完全靈活化，彈性僱傭使女編輯成為出版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A disadvantaged segment of the labour market)。這正如李金銓等教授的尖銳批評：「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的背後，是社會正義的失衡：農民和失業的城市工人在工作、房屋、教育、醫療、體面的收入方面在社會主義的『安全網』中被嚴重剝奪」(Lee, et al., 2008: 11)。

集團化彈性僱傭制度改革是推進市場經濟的舉措之一，其對知識

女工的生活實踐也產生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知識女工與資本建立了橫向聯繫，再沿襲胡斯的分析路徑，就是討論個人與資本的關係，「不僅有必要去考慮個人與生產方式的關係，而且還要考察個人與『消費方式』或者『消費再生產』的關係」(Huws, 2003: 169)。女編輯為了服務自己和家人(丈夫的薪水不足以維持家庭開銷)，她們必須向出版集團出售勞動力來換取薪水，為經營家庭生活或是未婚女工為自身經濟獨立，知識女工越來越需要投資資本貨物，如商品房、洗衣機、空調等，為了購買這些商品，知識女工與市場緊密連接起來。在參與問卷調查的出版集團女編輯中，16.7%獲得福利分房，83.3%沒有福利分房，僅18.2%享受住房補貼，81.8%沒有任何住房補貼，36.2%無力購買商品房，63.8%購買了商品房，其中53.5%需要還款，借貸3,001至5,000元佔31%，2,000元以下佔38%，2,001至3,000元佔31%，教育報刊總社被調查的知識女工則略有不同，購房貸款2,000元以下佔41.2%，2,000至3,000佔29.4%，3,000至5,000佔29.4%，教育報刊總社的知識女工住房補貼獲得者相對比例較高，佔64%，但仍然有88%的知識女工沒有福利分房，而且46%承受貸款壓力。而在2008年之後，上海房價和物價的飛速增長更是令工薪階層的編輯望房興嘆，連做房奴的資格也沒有了。

多數業界與學界人士在為明確出版集團的產權呼籲，並積極介紹西方媒介市場運作的經驗，試圖以之取代中國本土出版集團化改革不夠商業化的方面，許多人也擔心如果批判大陸傳播產業的商業化，是否不太合適？因為大陸傳媒集團的市場化改革才起步，歷史尚短，加上重重限制，商業化的程度很低，如果大力批判大陸媒介市場化，就容易犯上張冠李戴的錯誤。市場化使大陸媒介從嚴密的政治控制中獲得部分的解放，進而催生專業意理，在大陸具有正面意義(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 291)。但如果透過知識女工勞動貶值的微觀分析來檢視出版集團的改制問題，我們發現大陸出版集團以經濟指標替代了政治控制，經濟利潤的考核邏輯並非是提升出版專業素養，乃至改善編校質量，或者指望其為解放的動力，集團化追求的市場經濟一樣作為新的政治控制力量重構編輯的工作實踐，並以彈性僱傭制度剝削編輯的勞動力，其與傳統中國的集權式行政管理充分結合，作為「應對全球化

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對於國內鞏固政治控制提高經濟效益卻強有力。全球學家的主張為報業集團從市場壟斷中獲益，為國家促進思想和行政控制提供了自我服務的「正當性」(Lee, et al., 2008: 28–29)，出版集團也不例外。

知識女工除了遭遇勞動力貶值與工作的不平等待遇，還面臨犧牲家庭時間來完成工作的嚴重侵蝕家庭價值的加班勞動，現在，回家加班趕活是女編輯的普遍活動之一，這一實踐的可持續性建立在「勞動者」和「家庭主婦」界定的相互對立基礎之上，從定義上說，家庭主婦不是工作者或勞動者，儘管90%多的知識女工都要承擔家務，半成的女工為節約開支並不願意僱傭鐘點工，但婦女雙肩擔當的責任不減反增，她們回到家庭被界定為非工作者(non-worker)，工作時間之外的家庭趕活(延伸的工作)卻不為人所見。同時，出版機構需要節約生產成本，提倡產品快速上市，於是出版機構通過機構精簡(校對科減員，甚至撤消校對科)，責成編輯以編代校，無形中增加了編輯的工作量。從調查數據顯示，出版集團94.9%的女編輯都有回家繼續加班趕活的經歷，每周平均家庭加班時間41.9%女工為6小時，19.4%11到20小時，19.4%的圖書女編輯加班21小時以上，報刊總社66%的女編輯回家趕活，數量相對圖書編輯少，因為雜誌定期出版，生產節奏相對穩定。按照當下的出版工作量化評估標準，做得多意味着工作效率快捷，這是完成工作量與爭取獎金的前提，而且隨着企業化運作的不可逆轉，她們既不能輕易錯過增加收入的機會，也無法抗拒集團公司追求效率與利潤目標，反而自覺開始適應市場要求並順服、內化於出版企業的價值觀念，更加減少出差開銷或是其他成本支出，琢磨如何盡快尋求贏利產品。知識女工普遍反映集團追逐商業利潤，彈性僱傭制度改革沒有極大改善她們的生存境遇，反而面對當前的低收入、工作壓力、家庭負擔、體力不支、性別歧視等因素導致她們承受更加沉重的生存壓力，影響了事業發展。有相當部分的女編輯，在家庭負擔重壓之下，對工作收入仍然充滿預期，她們在問卷上填寫希望收入從目前的三至五萬提升到八至十萬，以大陸實際的經濟與物價增長速度，女編輯勞動力的價格確實低廉。顯然，「女編輯的家庭位置與工作」意識形態是具有生產性的物質力量(productively material force)，婦女勞動被納

入現代化的文化生產市場，她們的勞動力在中國出版業制度改革進程中進一步被無產階級化。

那些原戶籍屬於非上海市的高校畢業生，已經在1998年之後成為出版行業新人的主力軍，中國大陸區域的不平等重新被利用到上海市場經濟的繁榮與增長之中，而出版產業集團化再階層化的管理高層(男性精英主導)對知識女工的彈性僱傭政策更加強化了出版業的男性宰製權威；策劃編輯與文案編輯的劃分，顯示出集團管理領導強化工作位置差異的意識形態，文案編輯(女生佔85%)與集團可持續增長的利潤指標所要求的能力相懸殊，她們需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再技能化，屬於沒有市場創意與贏利的、次要的、沒有升職前景的出版勞動力，必須仰賴編輯海量的文字才可以完成基本工作量，並且因為文案勞動力很飽和，市場供大於求，負責文案的知識女工完全喪失與集團討價還價的工作位置優勢。而被訪談的若干女策劃編輯卻憂患生育失去職位，一再推遲生育時間，已婚女策劃編輯則因出差或是工作應酬，無暇顧及看護培育孩子學業，難以家庭和事業兩全。這說明市場經濟轉型進程中，知識女工就業賦予的權力已為國家去社會福利化、去公共服務化與彈性僱傭制度所消解，同時，家庭還仰賴婦女無酬家務勞動應對孩子養育服務的徹底市場化，她們不得不面對新的經濟困難和機會成本，她們的主體利益被損害，準備承擔生育導致的職業中斷，或是工作被邊緣化。自2007年以來，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推進集團化深入進行的另一舉措是吸引民營資本進入出版業，使出版實體的資本來源多樣化，並給予工作室自由參與出版的正當性。我們可以預見無論資本是源自集團本身或民營企業，還是來自海外，知識女工的勞動最終將為資本和集團權力所操縱。出版集團擁有資本和知識女工的勞動力，出版集團經營模式越是被強化，勞動力價值分化越是加劇，收入不平等與勞資矛盾更加昭然若揭。不難想像，通過國家政策執行的知識勞工勞動力商品化的幅度與強度還被在繼續徹底推進，「市場化的機制」和利潤效益衡量出版產業的發展邏輯，將持續不利於知識女工發揮抵制不平等待遇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透過本論題的經驗分析，我們從社會性別和彈性僱傭制度的關聯性，可以發現出版集團改制重構的等級制度塑造了知識女工的企業身

份，她們當前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護，出版集團彈性僱傭制度的全面執行顯示着經濟整合的社會性別化的動態進程，這是一個普遍存在、不斷流變的權力過程。後社會主義受到兩種推動：重新納入全球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版權部門的增加，婦女利益因為市場經濟轉型被犧牲，婦女失去工作和社會福利，卻還擔負養育子女的職責，這是社會主義的退步 (Barbara Einhorn, 1993: 67-8)。知識女工可能懷孕、休產假，出版集團認為僱傭女編輯的成本比男編輯更加昂貴、不可靠、效率低，社會性別與後社會主義的聯繫，出版集團化過程影響的不僅僅是女編輯的工作條件的惡化，生活成本劇增、生活壓力加重，更為殘酷的是知識女工的勞動力價值被嚴重貶低；同時，知識女工的家庭空間已被要為市場經濟創造可持續增長的利潤的工作所侵蝕，由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承諾給城市女知識分子的固定工作和保障性的物質支持，作為社會主義的低效和退步的象徵，已在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經過出版集團化改革的彈性僱傭模式推進中消失。如果把知識女工的貧困化、去權力化、無產化所導致的階級地位向下流動作為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來考察，⁹其構成的制度來源則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語境中政府步履西方媒體集團模式 (企圖對出版業全面商品化)，並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固有的資源再分配的男性精英霸權，重新再定義了知識女工的工作位置與被剝奪的經驗，而且中國大陸區域之間不平等與社會性別的身份等級已成為上海出版業彈性僱傭制度普遍實施的可利用資源與策略基礎。

註釋

1. 本文係2007曙光項目「中國圖書出版集團化研究」和2011年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傳播新科技、知識勞工與市場經濟轉型」(11YJA860003)的系列成果之一，感謝研究助手張月、方兆玉、趙曉軍、韓紹偉同學等參與問卷調查和數據統計，以及褚悅聞同學的文字校對。特別致謝2010年2月11日哈佛大學著名社會學家Ezra Vogel教授和Martin Whyte教授主持的China Sociology Group的各位學者與博士生對本論題演講的討論。知識勞工的提法首先受益於凱瑟琳·麥可切爾與文森特·莫斯科(Catherine McKercher

& Vincent Mosco, 2007)聯合主編的論文集《信息社會的知識勞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一書，全書19篇論文彙集了新近知識勞工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語境中的勞動分析，分別討論了電腦動畫、電影、圖書館、報紙等產業的知識勞工的勞動如何被商品化，這是國際學界關於傳播從業者勞動與媒介產業商業化關聯的批判前沿研究。因筆者曾經從事學術圖書的編輯工作且加入上海市女編輯協會，熟悉出版業界的運作機制和女編輯的社會處境，所以特別關注出版業中的知識女工，此文與筆者的另一專題研究「新聞民工修辭的政治經濟語境分析」(側重媒體新聞記者勞動力商品化的研究)共同作為「知識勞工與中國大陸傳播產業彈性雇傭制度改革」的探索研究。

2. 例如2009年最新統計顯示上海各出版社專業技術人員(編輯崗位獲得高、中、初級職稱者，不包括黨政幹部和經營人才)2,043人，其中女性1,032人，年輕編輯群體中女性比例持續遞增。報業從業人員4,983人，其中女性2,363人；期刊從業人員4,941人，其中女性2,371人(材料來自研究者2009年5月的數據調查，上海新聞出版局提供)。
3. 中國大陸的出版集團根據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文件精神自1998年集團化改制試點開始，以「做大做強」的理念在全國進行產業改革的總動員，從而應對全球化國際出版業的海外競爭趨勢。產業界、學界聚焦出版轉制與體制改革、政府的職能轉變、出版企業的核心作用與競爭力、人力資源與管理隊伍、出版集團的定位與戰略、數字出版、版權貿易逆差等關鍵問題不斷論爭(趙斌，2000；崔保國、陳星；2002；何志勇，2003；楊海波，2005；周蔚華，2005；曹晉、韓紹偉，2008)，尤其是呼籲明確出版業產權的研究甚為廣泛，筆者幾乎沒有發現知識工人階級的學術分析文本，也就是說，真正從編輯主體位置來反思集團化改革弊端的研究十分罕見。
4. 按照教育報刊總社《規章制度彙編》的暫行規定：自2001年3日起執行的新進員工收入為「採編人員：完成規定工作量者最高可得2500元/月(含飯貼，可含業績提成)。……為了吸引高學歷、高層次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來我社工作，特設學歷補貼：博士500元/月，碩士300元/月。」自2003年1月起，總社文件《規章制度續編》又規定「新進應屆大學生從事採編、編務工作的，一年內前三個月試用期工資參照事業單位見習期標準，第四個月起執行上限為2500元(含飯貼等)的規定及相關規定，其間設1000元、1500元、2000元、2300元四檔，由編輯部視情況定，他們一年內的收入由總社根據編輯部所定標準統一制單，作補差處理。一年後除基本工資(參照事業單位標準)外，取消工資補差，獎金等

從部門獎金額度支出。從事經營工作實行底薪加業績提成。其他新進人員除基本工資外(參照事業單位標準)，其獎金等自進總社起一律列入部門獎金額度中。」

5. 曹晉、趙月枝(2007)。《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讀本》(*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 Reader*)。復旦大學出版社，頁10。
6. 曹晉。(2009)，《新概念出版論叢·總序》。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1。
7.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1980年代迅速向全球擴張，所向披靡，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從僱傭勞工者到財產所有者都在進行重新分配，這種「新型無情經濟」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就是以彈性僱傭的制度造成員工工資與福利的縮減，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數字資本主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楊立平譯)論著中指出的：「作為數字資本主義的先鋒，微軟公司『在美國尤其是高科技公司中率先採取以下措施：全職臨時工制。這一方面可以為公司節省幾百萬美元的福利費；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計算機啓動這樣短短的時間內將員工解僱』」(中文版：頁282)。
8. 李金銓等教授對深圳報業集團的研究(Lee, et al., Chinese Party Pu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I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4), 581–602. [2006])和陳韜文教授領銜所進行的全國抽樣調查(Chen et al. 1998，也可參見羅文輝與陳韜文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台灣巨流圖書公司)一致，表明經濟相對富裕的新聞工作者越來越政治冷漠，去政治化和安於現狀。筆者研究的女編輯是因為擔心失業、經濟收入和忙碌於追求利潤考核而疏於過問政治。
9. 此一理念受益於李靜君〈勞工與性別：西方學界對中國的分析〉指出：「在眾多的研究基礎上，我想提出一個理論方向，就是把中國勞工問題理論化為一個階級構成的問題，因為這樣才可把握這個時期中國勞工身處的歷史，結構處境。這題域，不單只用於勞工，即使是中產、資產階級都存在一個構成的問題，階級不是客觀的產權擁有、或在結構裏的一個位置，而是一個歷史過程，是群體間的關係亦即是涉及群體的爭逐，及不因應政治、經濟條件而變化的開放過程，是在爭逐的過程中，形成階級間的分野及階級內的聚力，所以，階級是動態的，是一個過程，它不是structure或agency，而是兩者的關係，籠統的將不同收入的群體稱為(階層)或只強調收入、聲望、教育、財產的差距是不足以說明社群間的關係性質及分層的機制。若說改革前中國經歷由國家自上而下的再階層化(re-stratification)且是階級關係的廣泛出現，它的制度來源是私有產權及利益。」資料來源見李靜君(1999)，〈勞工與性別：西方學界對中國的分析〉，<http://www.thesc.org/laogong/ljj.htm>。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丹尼爾·貝爾(1997)。《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銛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原書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Dan nier, Beier. (1997). *Hou hongye shehui de lailin—dui shehui yuce de yixiang tansuo* (gaokuo deng yi).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yuanzhu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李靜君(1999)。〈勞工與性別：西方學界對中國的分析〉。取自中國社會學網，<http://www.thccsc.org/laogong/ljj.htm>。
- Li Jingjun. (1999). *Laogong yu xingbie: xifang xuejie dui zhongguo de fenxi*. Retrieved from zhongguo shehuixuewang, <http://www.thccsc.org/laogong/ljj.htm>.
- 沈原(2006年11月)。〈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3-37。
- Shen yuan. (2006, November). *Shehui zhuanxing yu gongren jieji de zai xingcheng*. *Shehuixue yanjiu*, No. 6, pp. 13-37.
- 林南、邊燕杰(2002)。〈美國社會學界的中國社會分層研究·代序言〉。邊燕杰、盧漢龍、孫立平(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頁1-40)。北京：三聯書店。
- Lin nan & Bian Yanjie. (2002). *Meiguo shehuixuejie de zhongguo shehui fenceng yanjiu, daixuyan*. Bian Yanjie, Lu Hanlong, & Sun Liping (bian), *Shichang zhuanxing yu shehui fenceng: meiguo shehuixue xuezhe fenxi zhongguo*, pp. 1-40.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曼紐爾·卡斯特著(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Castells, M. [2000].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 Man niuer, Kasite zhu. (2001). *Wangluo shehui de jueqi* (Xia Zhujiu & Wang Zhihong deng yi). Beijing: shehui kaxue chubanshe. (yuanzhu Castells, M. [2000].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 張宛麗(2000年1月)。〈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24-38。

- Zhang Wanli. (2000, January). Zhongguo shehui jieji jieceng yanjiu ershi nian. *Shehuixue yanjiu*, No. 1, pp. 24–38.
-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台灣巨流圖書公司。
- Luo Wenhui & Chen Taowen deng. (2004). *Bianqian zhong de dalu, xianggang, taiwan xinwen ren yuan*. Taipei: Taiwan juliu tushu gongsi.
- 邊燕杰與羅根(中文版2002)。〈市場轉型與權力的維繫：中國城市分層體系之分析〉(畢向陽譯，秀英、孫立平校)。邊燕杰、盧漢龍、孫立平(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頁427–459)。北京：三聯書店。(原書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739–58.)
- Bian Yanjie & Luogen. (zhongwen ban 2002). Shichang zhuanxin yu quanli de wei ji: Zhongguo chengshi fenceng tixi zhi fenxi (Bi xiangyang yi, Xiuyin, Sun Liping jiao). Bian Yanjie, Lu Hanlong, & Sun Liping (bian), *Shichang zhuanxing yu shehui fenceng: meiguo shehuixue xuezhe fenxi zhongguo* (pp. 427–459).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yuanzhu 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61, pp. 739–58.)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atherine McKercher, & Vincent Mosco (Ed.).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Einhorn, B. (1993). *Citizenship. Gender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 Eisenstein, Z. (1998). *Global Obscenities: Patriarchy, Capitalism, and the Lure of Cyberfantas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uws, U.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cKercher, C. (2008年6月)。〈勞動婦女：社會性別、政治經濟和信息時代〉(曹晉等譯)，上海復旦大學「技術與制度：中國傳媒改革開放三十年」國際會議論文。
- McKercher, C. (2008, June). "Working Women: Gender,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une 14–15, 2008.
- McLaughlin, Lisa & Helen Johnson. (2007). Women and Knowledge Work in the Asia-Pacific: Complicat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 Catherine

- McKercher, & Vincent Mosco (Ed.),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49–266.
- Moghadam, V. (2005). *Globalizing Women: Transnational Feminist Network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tanworth, C. & Stanworth, J. (1997, October). Reluctant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clients: The Case of Self-employed Freelance workers in the British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16 (1), 58–73.
- Webster, F. (2006). *The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hite, G. (1996, September). Chinese Trade Un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wards Corporatism or Civil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34 (3), 433–457.

本文引用格式

- 曹晉(2012)。<〈知識女工與中國大陸出版集團的彈性僱傭制度改革〉。《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0期，頁11–40。